



论十八大以来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与发展

□ 郑晓卉

[摘要] 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历程作了梳理回顾,更加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联,并鲜明地强调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 and 总任务,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特色”。党的十八大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

[关键词]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回首近代以来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给出了一个更加掷地有声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9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开创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透过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不难发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阐释所体现出来的理性与确定,所彰显出来的自信与憧憬,党的十八大表现得最明显、最充分和最全面。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党的十八大理解为是对过去90多年来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根本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起点、新征程。

一、全面总结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确立和坚持了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脱离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P544)}。回归于起初的萌生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整体性过程的理解,实际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并不存在一个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上断裂的过程。这对近年来出现的将“改革开放前28年和后30年”“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绝对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观念予以回应。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即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历史时期,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落后贫穷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充分肯定、充分认可和充分敬重,是对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紧紧团结、依靠和带领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所作出的重要奠基的科学阐释。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P10)}

不论是宝贵经验、理论准备,还是物质基础,无疑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团结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中形成的。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随即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宝贵经验,概括地讲,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理论准备鲜明地体现在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所发表的不少著述以及谈话当中。当时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特别是《论十大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实际上也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之间的关系,蕴含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思想,是富有前瞻性的思想。在物质基础方面,如60和70年代的“三线建设”,通过大规模的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



为重点目标的基础建设,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得到缩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初步改变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成为了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许多重大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发明、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成也都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因素都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除此,我们还应看到,毛泽东有很多想法观念实际上同后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和某些做法是一致的。如强调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实现按劳分配且不能过分贫富悬殊等。毛泽东后来看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实后,也曾强调要“以苏为鉴”,反对修正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路,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主动同美国建交。充分说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并非固步自封、唯效苏联。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曾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是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3][P117]}对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并非情愿全盘照搬,只是当时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不仅中国如此,当时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十八大报告以一定的篇幅来阐述不同时期党的领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发展的不同贡献,是一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是我们党的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这恰巧是社会主义国家要牢牢记取的。苏共之所以垮台,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它自赫鲁晓夫以后的苏共领导人学不会继往开来,后者贬低、否定前者,抽去了作为历史的前任的根基,使苏共的根基被彻底动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种深化,表明我们党已经具有了正确、科学的社会主义观。

二、阐释道路、理论、制度及三者逻辑关联,并以世界眼光坚定“三个自信”,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更为立体和全面

党的十八大在十七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作了强调和阐释。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了深入阐释。既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明确界定,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及其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作了区分,同时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成以及不

同制度间的层属关系作了剖析,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更为立体和全面。

我们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时,通常会从三种维度分别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或一种实践运动,或一种理论学说。同样,怎样才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清楚,也离不开这个三个维度。自然而然,我们会得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着眼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恰好是对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生动诠释。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表述与十七大报告相比较,引人注目地增加了三个内容,一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二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三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内涵更为全面、准确和科学,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富有时代感,又富有历史感,更具有前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具体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理论;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体系本身同时也在建设发展的实践中得以检验、丰富和发展深化。所以,它是开放的体系,而不是封闭的,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反映的是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的客观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作为一个制度规范的集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现阶段的中国所呈现出来的制度形态或制度要求,其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也是我国在当前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得以始终坚持和遵循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和方向的根本保证。

十八大在科学阐释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具体内涵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三者的内在关系,即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并认为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这在以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阐发而言是崭新的。它表明,我们党对当下所走的路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意识到“要走什么路”,“要走到哪里”,“怎样走才能走的更稳更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确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第一次立足于东方的中国,把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成功地



象化、具体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仅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种由“彼岸”到“此岸”的发展,在十八大报告中体现得非常充分。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创立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观点的科学性。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4](P179)}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5](P693)}列宁也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6](P163)}20世纪50至60年代,教条式地对待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纯粹理解为所有制形式上的公有制、分配方式上的平均主义、生产上的计划经济,照搬苏联模式,后来又单纯地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犯了不少错误,也走了不少弯路。这段历史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的正确模式,而只存在于具体的、民族的、历史的、带有各国不同特色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还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就在于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发展正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主题,30多年来我们才没有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问题中迷失方向,既没有出现像拉美国家70年代的经济持续衰退、贫富极度悬殊、政局动荡不断的“拉美陷阱”,也没有出现像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颜色革命”地缘政治灾难。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属性,正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的根本所在。科学社会主义属性或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现实条件当下的历史展开、具体实现和鲜活运用。

十八大首次提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从根本上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更为清晰理性,也表明我们敢于向世界特别是向“不时有傲慢与偏见之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昭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勃勃生机和活力。“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引人关注,从侧面

反映出社会主义在逐步令人“饶有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大所肯定、诠释和仍将长期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有利契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提出,深化了对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明了我国为什么不能搞纯粹的“一大二公”,甚至还得容许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存在,也说明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和任务,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种具体的认识深化。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崭新开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光辉前景。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成为“科学”,借用西方学者伊格顿的观点,正在于马克思“将注意力从未来的美好幻想转移到枯燥的现实工作中,但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真正丰富多彩的未来。他对过去的看法比很多思想家都更为忧郁,但他对未来的憧憬与很多思想家相比都更具希望”^{[7](P81)}。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称之为“科学”而不是“空想”,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真正找到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可行的“走出奴役之路”,而且他们意识到“那些投入在畅想美好未来中的精力,如果用在政治斗争中将会更有成效”^{[7](P73)}。社会主义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光说好还不行”。首先,总依据的提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方位问题。初级阶段,生产力远不够发达,无法消除两极分化,还得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也不能实现按需分配,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和生存的需要,人的自由个性发展也还受到多重因素的限制。在此历史条件下,任何先进的社会制度都需要讲求优先满足和解决人们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的第一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要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人民生活幸福的正确道路。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次,总布局的完善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具体的、阶段性的特殊形态要“注重些什么,建设发展些什么”的问题的认识。党对“总布局”的



认识是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从注重政治和经济,到注重政治、经济、文化,再到最后全面注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可以说越来越全面、科学了。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实践上讲,着眼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理论上讲,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建设发展些什么”的问题的回答。总布局实际就是总任务的具体要求。再次,总任务的明确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中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实现“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总任务提出了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要求,决定了当前需要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目标在现阶段的中国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共产党人看待和处理社会发展问题时遵循和坚持的长远目标、短期目标和中期目标的辩证统一的政治智慧。

总之,“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阐释,对我们党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明晰社会历史方位,科学实施社会管理,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具有深远意义。从起初“摸着石头过河”的迷茫中逐步探索,到今天坚定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三个自信”,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科学化认识的过程,背后彰显的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的提出,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及“特色”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特色”的提出,较早是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阐述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使长期以来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的内涵更加具体、更加丰富,对统一思想认识,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6]

哲学上讲“特色”,一般是说明事物发展或矛盾的特殊性,强调“一般里的特殊”“共性之中的个性”。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看,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种具体的、阶段性的、民族化的特殊社会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一种特定样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带有社会主义的一般属性(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具有中国的个案的特殊性(实质就是总依据)。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加上中国个案的具体性,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规律性。过去有的人常常质疑改革开放政策是“打左灯,向右走”“形左实右”,意指我国“改革是改向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此前,应该说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特色”何处,其实并没有过多阐释,甚至在某些思潮争鸣中还避讳谈论“特色”问题。党的十八大在这一问题上,旗帜鲜明讲特色,而且讲了“四个特色”,显然这是非常富有政治智慧的。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其实并不能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特色,“四大特色”只是认识的一个新阶段,不能将其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相反,这“四大特色”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四大特色”其实还有很强的抽象度和概括性,其已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问题提供了方向和角度,也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具体。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毛泽东文集(第八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7](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 [8]王炳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大特色”内涵的探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10).

[作者简介] 郑晓卉,女,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MPA(公共管理硕士)在读研究生,福建省长汀县县委党校教师。福建长汀366300。

【编校/蓝巧玲】